



气识兼备 情趣交织

——评电影《攀登者》

李建强

中国近代政治家、战略家和文学家曾国藩曾提出:好文章须有四样东西,即:气势、识度、情韵和趣味。他总结说:“凡文有气则有势,有识则有度,有情则有韵,有趣则有味。”其实,对于影像作品,有时亦可作如是观。新近由上海电影集团摄制的《攀登者》,就是这样一部气、识兼备、情、趣交织的作品。

一是气势。气势原本指的是人和物表现出的某种态势和力量。王阳明在《传习录》里说:“流行气,凝聚为精,妙用为神”,明确将人的精、气、神视为一体。依照他的见解,“精”是生命的本体,“神”是生命中呈现的理性,而“气”则将生命之能量传布于全身。所以有没有气势,常常决定了一部文艺作品的质地和分量。《攀登者》表现的是1960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往事。故事的发生地及其队员们面对的恶劣环境,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心理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: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,四季不化的冰天雪地,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,望而生畏的季风袭击……人与自然的艰难抗争,个体和团队遭遇的困厄险阻,构成了波涛涌起、吞吐山河的恢弘气势。

造就气势的,当然不仅仅只是外在的人与自然绝境的搏杀,与狂飙雪雨的决斗,更有内在的人的精神力量的凝聚和宣示。1960年第一次登顶后,因为缺乏环绕影像资料,遭到国际上的质疑,登山队也随即解散。壮志未酬,英雄迟暮。方五洲成了锅炉工,曲松林返回训练营,杰布回家放羊。人们可以想象他们承受的心理煎熬,但这些勇士如同殉道者一样的雄心一成不变。当1975年再次组队,杰布在冰塔林喊出“国土,就在脚下”的豪言壮语,方五洲在大风口宣示“路再难,也要攀”的决心、曲松林在大本营表达“登上中国人的山,测量中国的世界高度”的夙愿、基地政委在简陋的帐篷里重申“不管我们今天的胜利,还是未来的强大,都不需要所有人的承认”的铿锵时,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深厚的思想精神力量,顽强的民族精神定力。这是一个呼唤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时代,这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而终于在银幕上得到真实传承的历史。动于中而形于外,此种气势,此等襟怀,大气磅礴,气贯长虹,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之所在!

二是识度。对于艺术创作来说,识,说的是见地,见识;度,讲的是高度、深度。前者为因,后者是果;有因始有果,有识方有度。因此,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:“人才以智术为后,而以识度为先。”在一部记载人与高山峻峰激烈抗争的电影作品中,再现环境的险恶,呈现攀登的艰难,甚至展示英勇无比的流血牺牲,其实都并非难事。早先,德国、奥地利和瑞士联合摄

制的《北壁》做到了;新近,韩国的《喜马拉雅》,英国、美国和冰岛联合拍摄的《绝命海拔》也做到了。怎样在展现惊险奇特、进退维谷的险境中,浇灌一点人类理想的坚守,注入一些生命内涵的体验,特别是开掘古老民族伟大精神的宝藏,通过对攀登者不畏艰险、排除万难、至死不渝的精神追索,凝练和汇聚民族精神的真谛,以审美的方式拨亮在世心灵的光源和来日理想的灯火,进而影响受众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,以及国家核心价值的认识判断与行为选择,这是此类影片的首事和难点,也是《攀登者》特别值得关注和肯定的地方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困难时期。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岁月,中国领导人掷地有声地宣告:“中国的珠峰,中国人当然要首先登上去”,并亲自下令组建国家登山队,一批中国的攀登者携带简陋设备,冒着生死风险,前赴后继地向峰顶发起冲击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,一种什么样的气魄!正如编剧阿来所说:“我写《攀登者》就是写精神,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。当时国家极其困难,攀登珠峰几乎是不可可能的事,人的意志、国家意志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。”这种立论和见地,当然不是一般的认识和观念堪与比肩的,既投射人类思想的制高点,又有民族精神的强烈支撑,构成了一种意义和情感的“矢量”,因而凸显了高度、深度和厚度。

三是情韵。讲故事,离不开“爱”,拍电影,离不了“情”。《攀登者》当然也不能例外。应当说,主人公方五洲与徐缨的真挚爱情,新队员李国梁和黑牡丹的深厚情感,为影片增添了不少。方五洲为了完成登顶夙愿,置放个人的爱情,阴差阳错,历15年而无悔;而徐缨对方五洲亦一往情深,不管沉浮起落,坚定支持他的事业,后来又主动请缨,作为气象组的负责人也来到基地,与方五洲并肩作战,直至积劳成疾跌倒在雪原深处。这样的真挚情谊,多少是打动一些人心的。同样,李国梁与黑牡丹因误会而相识,因关爱而生情,演绎了一代热血青年的爱情赞歌。可以想象,缺少了这两组情意悠长的人物感情故事,作品的精神韵致难免受到影响。

问题在于,有“情”未必有“韵”,泛情极易导致失衡。曾文正公指称的“情韵”,除了“真切”,还得“适度”,还要“内敛”。攀登者攀登的是精神之峰、意志之巅,是“经国之大业、不朽之盛事”,不是说不能有爱情,而是说,应当把爱情放到怎样恰当的位置?如今这般的,情感戏一发而不可收,直至占据作品的大部分篇幅,尤其是对“珠峰绝恋”、“深谷狂吻”等重头戏的刻意渲染,其实是偏离主线、事与愿违的。正如有的批评者尖锐指出:“这本该是一个史诗级的电影,但被拍成了爱情

片。”一部本该“阳刚”的戏,却被“阴柔”所主导,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肢解了《攀登者》的主旨硬核,也成为影片最大的不足和明显的硬伤。指出这一点,并非要否定影片的成就,而是想藉机为同类创作号诊把脉:“戏不够,情未浓”、“乱撒爱情胡椒粉”的老黄历真得改一改了!这,亦可看作是《攀登者》对中国主流电影未来攀登高远的一次警策!

四是趣味。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宣称:一部电影要想成为一部打动人的作品,就一定要把电影美在影片中表现出来。如果它被很好的表现出来了,人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一种特别深的情感。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卡则告诫,电影带给观众的应该是情感而非政治观念。作为一个导演,应该形象有力地阐释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去宣读一些二手政治论文。两位大师的表白,其实都强调了趣味之于一部影像作品的意义。而对于《攀登者》这样一部主题严肃、题材庄重的影片,这不啻是个考验。编导的精心和匠心也由此生发出来。譬如体能训练场:黑牡丹因心疼李国梁,克扣了10秒钟,被身为副指挥的曲松林察觉,于是毫不留情地要求李加练。李一时难于接受,恼怒地质问:“你为什么针对我?”曲坚定而又沉稳地作答:“不是针对你,是因为更珍惜你”……一问一答,一张一弛,针尖对麦芒,揉进一位内心受过伤的铁血男儿立体的丰富世界,也将人物的性格前史、内蕴的坚硬与温柔和盘托出,非常耐人咀嚼。再如方五洲和曲松林重逢桥段:对视、握拳、举杯、畅饮、相拥一气呵成,举手投足拿捏到位,一颦一蹙把控到位。渡尽劫波兄弟在,相逢一笑泯恩仇,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,将这一对生死兄弟如释重负、冰释前嫌的隐秘心底袒露无遗。

可见,庄严并不排斥情愫,凝重也不扼杀幽默。艺术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,人造的藩篱一旦剔除,尽显艺术镜像的本真,承载无穷的审美快感。其实,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不事雕琢、无痕无痕的寻常“趣味”,故事才好看,人物才可信,英雄才出彩,平凡才伟大。《攀登者》在这方面创造的新鲜经验,值得总结和借鉴。

总体说,《攀登者》携气势、见识度,重趣味,并在情韵上有所求(尽管有点用力过猛和过度),是一部拍得相当认真和成功的影片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:“衡量一个时代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。推动文艺繁荣发展,最根本的是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。”我们期待底蕴深厚的上海电影集团再接再厉,拍出更多更好回肠荡气的优秀作品。

(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、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)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:全民记忆、共同体美学和献礼片的3.0时代

饶曙光

作为庆祝新中国70华诞的献礼片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成为了国庆档的“种子选手”,上映十九天票房突破27亿元,进入国产电影票房前十排行榜。不同于以往献礼片的史诗风格和传记类型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在宏大历史中融入了个体关怀,用差异化表达引发了共鸣,它用7个历史瞬间,拼凑出了一个历经70年发展的全景中国及其中的百味人生。更为让人欣喜的是,影片为献礼片在叙事、美学、市场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。

平民史观凸显个体关怀

影片取名为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从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,以“我”作为主体,突出了个体的重要性。因此,全片的7个故事都没有革命领袖和重大历史事件,反而从细微之处着笔,讲述了不同时段下个体与祖国的故事。该片抛弃献礼片惯用的宏大叙事方式,以平民史观切入平凡人物的小故事,使得个体对于国家的记忆和情绪在潜移默化中累积,从而在影片结尾得以爆发,堪称“百炼钢化指柔”。

为展现新中国成立这一神圣时刻,《前夜》篇首次选择了伟人身后的普通设计员林治远作为主角,他为红旗奔波劳碌的故事,揭开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前夜那普通但动人的一幕:1964年,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在举国欢腾背后,是无数像《相遇》篇中高远一样舍弃爱情、健康的科研人员;80年代的女排精神鼓舞了一代人,而《夺冠》篇里保证弄堂里居民见证夺冠时刻的竟然是小学生冬冬;都知道香港是1997年7月1日回归的,但《回归》篇讲述了鲜有人知道0时0分升起的国旗背后的努力,而回归也不仅是国家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,它于如华哥一样的普通家庭而言更是意义重大;北京奥运会不只是世界的盛会和国力的象征,同时也是《北京你好》篇里的“哥”拉近与儿子距离、汶川学生了解已故父亲的纽带;近年来,国家的扶贫攻坚战和航天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,都给了人们新生活的希望,这促成了《白昼流星》篇中老李的带病坚持和兄弟俩的迷途知返;没有人想缺席祖国彰显国威的时刻,但总需要有人默默守卫,《护航》篇借女飞行员吕潇然的成长和坚守,演绎了大国重器的柔情一面。

英雄史观的故事,着实会让人们了解彪炳史册的战绩背后的壮烈,进而感受到仁人志士和革命领导者的浩然正气。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从微观层面切入,挖掘的都是大事件背后的小细节,描摹的是历史的另一面。其人物形象也不再是抽象的符号,而是一个个体的人,有情感,有爱恨,有梦想,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。

正因为是一个具象的人,所以片中的林治远不是万能的,他执拗、恐高,在结束庆典的时候会像小孩子一样跳跃起来;高远会在看见昔日恋人的时候躲闪不及,迟迟不敢摘下口罩;小学生冬冬保证大家看到女排夺冠而未能与小美见面后,也会躲进父亲的生活仍抱有太多不确定,哥哥甚至再次偷窃;完成护航任务的吕潇然,在最初也是饱含眼泪和委屈的。

影片的诸多细节都切实流露出宏大历史和个体命运之间的关系,并不依

靠“口号”,而这正是唤起观众民族情绪的重要元素,恰如总制片人黄建新给全片定下的基调“历史瞬间、全民记忆、迎头相撞”。

“共同体美学”诉求下的差异化表达

作为献礼片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因为让每一个平凡的“我”得到重视,激发了广泛的共鸣。而对于祖国的强大,每个人也都能感同身受,影片通过民族精神和个体关怀建构了一个“共同体”,让观众能够在其中实现情感上的认同。

在营造精神共同体上,影片中有许多俯拾即是的情感细节。林治远为了高展新中国第一面红旗,高远为了研发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,外交官和仪仗队为了在整点完成交接仪式,吕潇然为了重大阅兵顺利完成,他们都选择了以集体利益为重。即使不是参与者,从见证者视角切入的故事也让人感慨。影片中《夺冠》和《北京你好》虽然分别以女排夺冠和奥运开幕作为故事的大时代背景,但小男孩冬冬和“哥”张北京为成全他人而放弃了自己利益的时刻才是精妙之笔。《白昼流星》篇有着展示国家扶贫和航空事业的双重视野,在老李的努力下,贫瘠的土地和调皮的兄弟俩有了希望,卫星的“回乡”则预示着寓言变现实的必然。从影片的7个小故事可以感受到,仁爱、自强、团结等民族精神都融进了不同的叙事中,继续升华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,进而打动观众。

在具体呈现上,为了将“共同体美学”在视听观感上加强,影片每个单元的转场都分别以毛笔、铅笔或钢笔来一笔一划地写下即将讲述的历史故事和时间,中华文化的汉字之美成为了表达历史变迁的载体。而如《相遇》的开篇,镜头那一本《青春之歌》,既是片中的物件细节,也恰好是1959年国庆的重要献礼片目,历史时空的遥相呼应皆藏在这些细节之中。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在筹备伊始,总制片人黄建新便要求总导演陈凯歌,一定要吸纳不同年龄段的导演参与其中。因此,全片的导演有第五代导演先锋陈凯歌,亦有初露锋芒的“85后”导演文牧野,另有管虎、张一白、宁浩、徐峥、薛晓路等中生力量。从导演构成来看,不仅仅是聚集了老中青三代实力导演,更是因为这些导演力量对于电影市场的摸索,让影片在葆有一致情感和思想的同时,“主旋律”中有了“多声部”协奏带来的精彩。恰如电影理论家、美学家钟惦桦先生提到过的:“用和弦代替单音,在电影题材内容上,样式及片种上,从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甚至渴求。”

作为第五代的领军人物,陈凯歌用一则寓言统领全片,扶贫和航空事业的写实,与浩瀚戈壁的诗意相得益彰;擅长喜剧的宁浩、徐峥让小人物身上的可爱之处被放大;执导过多部爱情片的张一白和薛晓路,将情感的细腻之处拿捏到位;管虎的视听调度依然震撼,文牧野的表达也是一如既往地简洁。此外,还可以看到《夺冠》篇、《北京你好》篇和《白昼流星》篇等都在以儿童或少年为主角,与其他几个片段形成反差,在童真童趣中看历史,别有一番味道。

影片虽由7个篇章组成,但因为基于“共同体美学”,情感和思想都是高度一致的。导演们的创意,让故事有着不同的视角和风格,满足了不同层次、不同年龄、不同地域的观众多样化、差异化的需求。

献礼片的3.0时代

从1959年《五朵金花》“不喊口号”

开始的献礼片,经历了1989年《开国大典》讲述伟人平凡生活的尝试,还有2009年《建国大业》用明星和类型进行商业包装的策略后,市场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质量过硬的作品才能经得起考验。此次国庆档推出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可以看作是献礼片的3.0时代,是对“重工业电影”的进一步实践。

虽然国内的企业体系还有待发展,“重工业电影”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创作人员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,已经在为献礼片打样。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强调:“质量之魂,存于匠心”,而细节处最见匠心的真章。为还原好80年代的上海弄堂,导演徐峥找来了蜂窝煤炉、脚踏式缝纫机、老式电风扇、琴岛利勃海尔双门冰箱,甚至连易被忽视的电视机套上,都细致地绣了“彩色电视机”几个字;拍摄“回归”主题的薛晓路导演,不仅辗转找到了97年款英军军服来制作背景,还多方采访核实到当时英方负责人是美式英语发音,连当年真正的升旗手朱涛也加入到训练演员当中。在大银幕上,杜江将只有升旗手才能洞察到的吞咽鼻血的动作都精准还原。

造成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缓慢的人才问题,在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看到了解决的希望。影片的导演配比十分合理,在年龄上,他们从“50后”横跨到“85后”。在个人风格上,包含了擅长寓言式的、喜剧的、爱情的、现实题材的。其中最年轻的导演文牧野在求学时师承田壮,更是通过宁浩的“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”成长起来。即使如管虎、张一白、宁浩、徐峥、薛晓路这帮早已将市场化创作手法熟捻于心的成熟导演,也并没有在影片中炫技,而是踏踏实实、循序渐进地讲好了故事,逐步摸索到了一种能让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观众共享内容的方法。

在一个有机的电影工业体系中,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,也需要完善电影产业链条。献礼片早已不能通过“红头文件”来保证收益,90年代市场的滑坡已给出警告。献礼片要打开市场,如何宣发也成为了不容忽视的问题。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在宣发时,很重视对观众情绪的把握。在前期,有节奏地发布每一部短篇的特辑。最后的终极预告中,有整整一分钟都是如1998年洪水、2003年“非典”、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能引发全民记忆的历史资料,为该片的正式上线做好了情感铺垫。此外,影片还请来了王菲献唱主题曲,继续凭借王菲的明星号召力和歌曲一改以往字正腔圆的轻盈唱法,提升了观众的好感度。影片与芭莎的跨界合作,通过一组精心拍摄时尚大片,以“导演天团”的宣发方式,迎合了青年观众的关注。

一直以来,中国电影在尝试“走出去”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更是需要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,让海内外观众都能共享此次盛事。据《欧洲时报》报道,10月1日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强势登陆欧洲,在德国、英国、荷兰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卢森堡等同步上映,创造了中国影片欧洲最高预售纪录。

怎样讲述历史才足够动人?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既是对过去的回望,也是对未来生活的展望。影片从平民史观、共同体美学出发,在差异化的表达中将不同时代的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记忆,也巧妙地以适宜的商业手法传播主流意识形态。它在国庆档所凸显的电影景观,更是蕴藏了另一种电影的可能性……

(作者为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、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)

